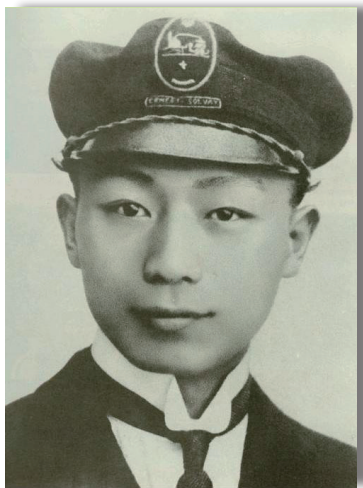


聂荣臻入党： 为四万万同胞均能享安乐

□ 卫惠笈



1919年12月9日，聂荣臻和同伴们乘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前往法国。万里远行，聂荣臻经受了精神和体力上的磨炼。1920年1月14日抵达马赛港。聂荣臻被分到蒙塔尔纪中学学习法文。在这里，他认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人。不久，因蒙塔尔纪中国学生太多，聂荣臻被转到法国北方的德洛，继续补习法文。生活在法国学生群里，逼着他必须很快掌握法语。他买了个小镜子，随身携带，经常面对小镜，读法文、讲法语、观察自己的发音口型。不到半年，法语水平就有了很大提高，开始学习数理化。当年秋，进了胡乃尔中学。这年底，积蓄将尽，他便去工厂做工，挣了钱再学习。

当时法国缺少劳动力，找工作比较容易。报纸上每天都有招工的广告，只要去封信，得到回信后，经过考试合格即可去做工。聂荣臻当过汽车轮胎检验工、钳工、车工、炼焦工等。无论读书还是做工，他都是在附近租间房子，几个人挤在一起，自己做饭，条件艰苦。

1921年，聂荣臻的生活出现了大的转折，现实斗争使他毅然投入到3次学生运动中去。

半年多时间里，聂荣臻参加了3次大的斗争。他看到了学友们为国家民族利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受了极大的痛苦。在斗争中，他思索着：祖国的前途何在？出路何在？进占“里大”斗争的失败，对勤工俭学生冲击很大，有些人相继申请回国。而聂荣臻则在1921年12月8日的家信中宣告：“学不成，死不归”。他于1921年11月底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进入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沙洛瓦大学设有工程、机械、化学等课程。他于1922年暑期考入该校化学工程系。

沙洛瓦大学校园宽阔，环境

优美，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又有学生宿舍，再不用为住房而忧虑了。但聂荣臻却不能潜心读书。因为他正在经历着世界观的转变。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西欧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出现了热潮，在中国国内，一批先进人物也积极传播马列主义，促成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国际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派代表人物也纷纷登场，竭力宣传各自的观点和主张。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思潮相互冲击、各种观点相互争鸣的纷纭局面。而这时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十分流行，出版的书籍和刊物很多。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各种思潮，相互展开着激烈的争论。10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生差不多都被卷进去了。他们不是拥护这个党派，就是拥护那个党派，像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还有共产党。留学生们一面做工、学习，一面参加各种活动。在各种思潮冲击面前，聂荣臻对“实业救国”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他反复思索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出国以来，他遇到的问题很多，思想经常处在矛盾中，觉得一切都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他就怀着这种矛盾的思绪，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等著作，还经常阅读从国内传到欧洲的《向导》等刊物。

《向导》把传播马列主义同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结合了起来，对聂荣臻启发很大。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终于他在思想上发生了飞跃，多年来目睹封建社会的腐败，军阀统治的残暴，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造成的贫穷落后等等大量感性认识，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他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所控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

从亲身经历的斗争实践中，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聂荣臻终于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1922年6月3日他给父母亲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得手渝久矣，海外游子，

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猖！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固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尸位饱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睹此？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之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这封信中所体现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成为聂荣臻世界观转变的起点，由“实业救国论”者变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革命论者。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8月，由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聂荣臻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主要讨论接受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和团员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聂荣臻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经过4天讨论，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选出5人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入团以后，聂荣臻和刘伯坚一起，负责团的旅比利时支部工作。他既要学习专业，又做革命工作，十分忙碌。专业学习时断时续，以致他的学生登记表上校方注明：不怎么上课。入团后他决心放弃沙洛瓦劳动大学的专业学习，集中精力做革命工作。至此，做一个工程师的想法完全放弃了，他开始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23年春，他由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旅欧学生中团员发展很快，人数很多，但党员很少，在比利时只有3个党员：刘伯坚、熊味耕和聂荣臻。

1923年暑假，聂荣臻到巴黎，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和节假日从事团的活动。从此，他与李富春、邓小平等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勤工俭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同形形色色的反马

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以斗争来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勤工俭学生和工人中的影响，争取了大批有志青年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根据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旅欧80余名党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1924年1月，成立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聂荣臻被选为处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继续攻读马列主义，进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办的夜校，和学习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并选送一批干部回国。选送回国的干部中就有聂荣臻。这样，他于同年9月22日离开了法国。1924年秋天，聂荣臻经德国去莫斯科。他在柏林住了一周。当时，德国工人运动高涨。小住中间，他还和德国工人一起上街游行，高呼口号。德国工人的组织纪律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他乘船取道波罗的海，经列宁格勒到莫斯科，10月份，奉命进东方大学学习，课程有十月革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以及政治经济学等。

3个月后，于1925年2月，聂荣臻被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学员全是从东方大学抽调的，和聂荣臻在一个班的有叶挺、熊雄、王一飞、范易、颜昌颐等共二三十人，王一飞担任翻译，聂荣臻担任中国班党支部书记。这个学校在莫斯科郊外，中国班对外是秘密的。学员们红军服装，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野营、演习、住帐篷、夜间站岗放哨。教员都是苏军的高级干部。在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5个月。时间虽不长，但却为聂荣臻日后戎马生涯打下了基础。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国内急需干部，一年前成立的黄埔军校也需要加强。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根据共产国际决定，一起回国。他们8月上旬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历时两个星期来到海参崴，从海参崴上船，驶向日夜思念的祖国。

聂荣臻在国外共度了5年多时间，如今已经26岁。5年前，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远渡重洋，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现在，他已经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踏上归途。

（摘自1999年第11期《支部建设》，原标题为《为四万万同胞均能享安乐——聂荣臻远渡重洋，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朱德的手电筒

□ 张少华

福建省平和县秀峰乡福塘村村民朱林生家里珍藏着一把锈迹斑驳的手电筒。手电筒为铝制外壳，柄长31厘米，头部直径8厘米，尾部直径5厘米，可容三节干电池，这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朱德使用过的手电筒。这把穿越历史风烟的手电筒，承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朱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起义军主力南下广东，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击败，朱德率余部转战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927年10月初，朱德、陈毅率领部分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大埔三河坝完成阻敌任务后，越过福建省平和县九峰镇柏松关，攻入平和县城，接见平和县委领导，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开展地方武装斗争。朱陈部队驻留平和期间，曾在秀峰乡福塘村歇住一晚，朱德亲手赠送一把手电筒给当地一位老农。因年代久远，这位获赠朱德手电筒的老农姓啥名谁，已无从考证。这把手电筒一直保存在秀峰乡福塘村“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纪念馆”里，为避免遗失，后来，朱林生特意将朱德手电筒带回家中珍藏。

1929年，平和县芦溪镇在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影响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发展地下党组织和游击战争，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斗争中，当地共有546名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组织，其中64名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朱德、陈毅等革命前辈在芦溪镇停留时间虽然短暂，却给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带来巨大的革命斗志，有力推动当地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发展，为平和县党组织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起义军战士视民如子、严以律己，给当地群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摘自2018年7月2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宋庆龄为什么党龄15天？

□ 李 涛

作为20世纪举世闻名的伟大女性，宋庆龄曾经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正式的一次是1957年4月，但是宋庆龄当时的这一心愿却为毛泽东所婉拒，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大革命开始，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经历了几十年的考验，无论在胜利还是遇到挫折时，她与共产党的合作始终如一，在心中早已把共产党视为孙中山革命理想和事业最忠诚的继承者和领导者。1956年9月，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邀，宋庆龄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她无比激动，这是她“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在会上，宋庆龄发自肺腑地说：“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坚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将会成为全世界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会后，毛泽东特意到宋庆龄的寓所去看望她，征求她的意见。

1957年4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会见刘少奇。刘少奇向她谈起共产党内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并言辞恳切地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党。”宋庆龄点头称是，非常赞成这

一见解。她向刘少奇倾吐了自己埋在心中的渴望：“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但还是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上海宋庆龄寓所向她转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诚恳地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所有重要文件都送给宋庆龄审阅。

宋庆龄就不再说什么了，从此以后，宋庆龄就再没有提出入党的要求。到了1981年5月，宋庆龄病危。15日早晨，王光美去看宋庆龄，问她，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还有没有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宋庆龄表示还是希望入党。所以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批准接受宋庆龄为正式党员。5月29日，宋庆龄逝世。

宋庆龄入党以后，她的党龄满打满算15天。她是党龄最短的党员之一，但是邓小平把她称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这个评价其实已经说明了，她在入党以前已经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思想上和党是完全一致的。

（摘自2014年第8期《新湘评论》）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妇女的价值。这不是出于怜爱，而是她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红星照耀之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海伦·斯诺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在浩浩荡荡的长征队伍里，活跃着一批红军女战士，她们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气概，走过万里征程，胜利到达陕北。

红军3个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有近2600名女红军，其中中央红军有32名，红二方面军有20多名，红四方面军有2500多名，红二十五军有7名，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幸存者仅有350余人！

女红军用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描绘了一幅幅悲壮的中国革命画卷。参加长征的32名中央红军女大都成为共和国女战线上的女杰！

这32位女红军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月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阚思颖、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

中央红军长征女战士最终只24人到陕北

□ 王一心

华、曾玉、刘彩香、邱一涵、吴仲康、彭儒、黄长娇。

实际上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为什么会有32名女红军参加长征呢？原来有2名没有经过组织批准而是自己偷偷去的，1名是曾玉，另1名已无从考证了。

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时，竟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成为“编外”成员。因为“编外”，她没有口粮，没有装备，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只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紧紧跟随着大部队。

曾玉的坚强和执着，深深打动了同路的女红军。蔡畅、邓颖超、贺子珍等人对她一路上照顾有加，匀一口饭给她吃，腾一个角落让她休息。既然已经走在一起了，就决不让她掉队！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需要符合中央内部规定的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中共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

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

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

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当时共有100多名女红军拿到体检通知，但经过严格的检查，身体条件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

没有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其实，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

工部长，金维映是中革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中共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中革军委机要秘书。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势，这些女红军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8块钱作为生活费。“寄”，在当时是一个最可怕的字眼。女战士们不怕险山恶水，不怕饥寒疲劳，就怕一个“寄”字。为了便于统一行动，红一方面军一出江西，便将女红军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她们以自己照料自己。由于条件的限制，组织上没有给她们太多的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红军毫无二致，只是有的人偶尔可能会骑几天马。

最令人感慨的是，在这32人中，还有一个“小脚女人”，她就是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她克服了一切困难，最终到达了陕北，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却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一次，邓六金发烧。一路上，危秀英将自己和邓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搀着极度虚弱的邓六金，还削了根棍子让她拄着。到了晚上，两个人依偎着仅靠半条毛毯取暖。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

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死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她们相互扶持，最终走完了长征路。

令人惋惜的是，32名女红军中，

